

杜正勝  
台北故宮博物院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收藏一幅清乾隆臺灣古地圖長卷，長666公分，高48公分。右起於沙碼碼頭，左止於雞籠山與雞籠棧，即臺灣從南到北的西半部（圖一）。此圖開卷題詞有云「圖內民番界址」，故定名「臺灣民番界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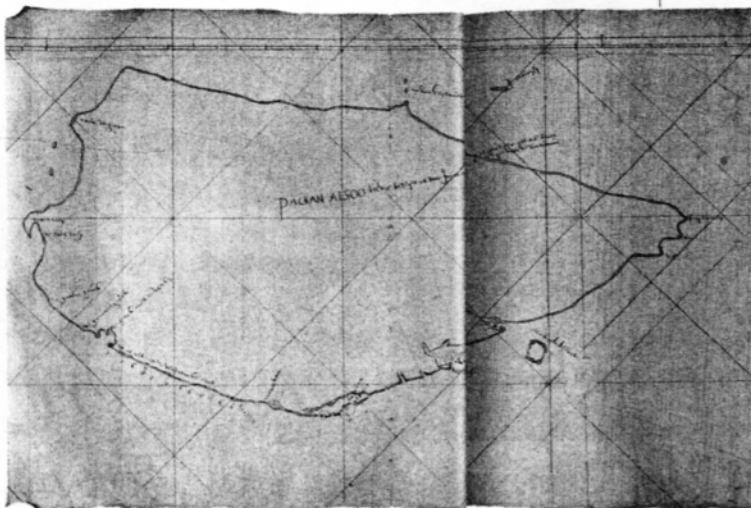
這是所謂的山水地圖。此類長卷的臺灣山水地圖，今日臺灣所存者，尚有多卷，幾年前在史語所共同展出，有的詳記深山原住民聚落（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有的描繪平埔原住民風俗產業（如國立臺灣博物館所藏），而標識深山原住民與平地漢人或漢化平埔族之界域者，則為本卷的一大特色。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示我一種類似本卷地圖的幻燈片，只見臺灣縣和諸羅縣交界以南的部分，據說原件藏於莫斯科。經過初步比對，莫斯科卷開篇題詞與本卷大致相同，但只說「圖內界址」云云，不如本卷之正式，有可能是本卷的另一繪本。

\* \* \*

臺灣之有比較正確的地圖，可能推始於荷蘭人Jacob Ijsbrandtsz Noordeloos在1625年製作的「北港圖」（PACKAN ALSOO；圖二）<sup>①</sup>，雖題「北港」，其實全臺輪廓形貌已經具體而微。此後西方人製作不少臺灣全部或部分地區的地圖，大抵皆有精準的經緯度，與中國傳統的里程地圖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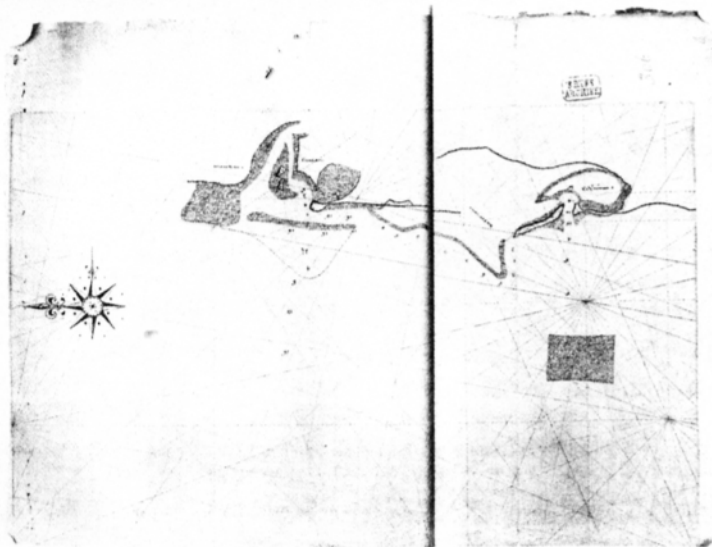
地圖之繪製要先實地履勘，這是一件大事，人力物力所費不貲，非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作後盾難以為功。

事實上地圖也是統治者控制土地人口等資源、掌握國防戰略形勢的有效工具，所以製圖便成為國家的重大政務。基於此理，臺灣之有地圖當自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始（圖三、圖四），而中國人之製作臺灣地圖亦當從明鄭政府才開始<sup>②</sup>。杜臻《粵閩巡視



圖二 北港圖（出自《漢聲雜誌》105期，圖版6）

紀略》卷六〈附紀臺灣澎湖〉曰：鄭克塽降清，「盡籍其境，土數千里，戶口數百萬，為圖以獻。」此圖當是明鄭統治臺灣期



圖三 大員海港圖（出自《漢聲雜誌》105期，圖版 5）

①《漢聲》105，《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圖版6。

②范成，《重修臺灣府志》卷十九〈雜著〉著錄沈光文著有《臺灣輿圖考》一卷，莊吉發教授推定這是中國人最早繪製的臺灣地圖，恐不正確。沈書即是圖考，當是據政府勘測的地圖所作的文字考證，不能稱作地圖。事實上沈氏以一介布衣，飄流來臺，不可能獨力完成臺灣輿圖。莊說見《故宮臺灣史料概述》，頁1。

間繪製的，進獻後應該存於清宮內府，今未之見。

杜臻奉命巡視粵閩，畫定疆理是在清朝征服臺灣那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一月至翌年五月，《四庫提要》說，他未親履臺灣，只據咨訪所得者錄之。杜臻官拜工部尚書不一定有機會看過鄭克塽進獻的地圖，不過據他說施琅「身自渡海，行定新附地，絕域盡入版圖矣」，則他「按圖」而述的聚落、景觀和里程等資料，很可能是施琅所畫的地圖<sup>③</sup>。四庫全書本的《紀略》附有粵閩「沿海總圖」，沒有臺灣圖，所以施琅的臺灣圖怎麼畫法，也不得而知。

清朝統治臺灣，因應不同的需要，多次勘繪臺灣輿圖。史語所藏卷據施添福教授考證<sup>④</sup>，當係乾隆二十五年（1760）閩浙總督楊廷璋「清釐臺屬邊界」時所繪製。其說可從，茲不贅述。按早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耶穌會教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馮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和德瑪諾（Romain Hinderer）三人銜命來臺繪製輿圖，經方豪院士考證<sup>⑤</sup>，這是有經緯度的臺灣圖，和雲貴諸圖一樣，丈量踏繪，其法之精，在中國

是從古未有的（參考圖一，見第二頁）。但這種精準的製圖技術，今日所見的諸本清代臺灣輿圖都沒發生影響，本卷雖然上距馮秉正的勘繪將近半個世紀，依然是傳統的山水地圖，即是明證，臺灣各種方志的輿圖也無例外。

雞籠海岸海圖（出自《漢聲雜詠》105期，圖版 11）

4

不過中國傳統地圖重視實用，以備治理之需。本卷除標識府縣官署所在的城邑外，沿海與內陸兵丁駐紮營地比其他諸卷山水地圖都較為詳細。兵營稱「汛」或「塘」。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1807）卷四〈軍志〉汛塘條解釋說：「設弁帶兵曰汛，僅安兵者曰塘，城內置兵宿守者曰堆。」汛與塘之區別在於有沒有軍曹。然而本圖瀨口塘（大約今日臺南市鹽埕一帶）旁注：「把總一員，安兵四十名」，軍官駐守也稱作塘。另外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詳列番社名稱的臺灣地圖，據考亦製於乾隆中期，與本卷相近<sup>⑥</sup>，其中有許多汛都只置兵丁而已，沒有設軍曹<sup>⑦</sup>。

③ 詳參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六，四庫全書本，頁460-1121以下。田中克己以杜臻所述即是明鄭的臺灣輿圖，恐不確。田中之文見陳乃華譯〈鄭氏之臺灣地圖〉，《臺灣風物》6:1，19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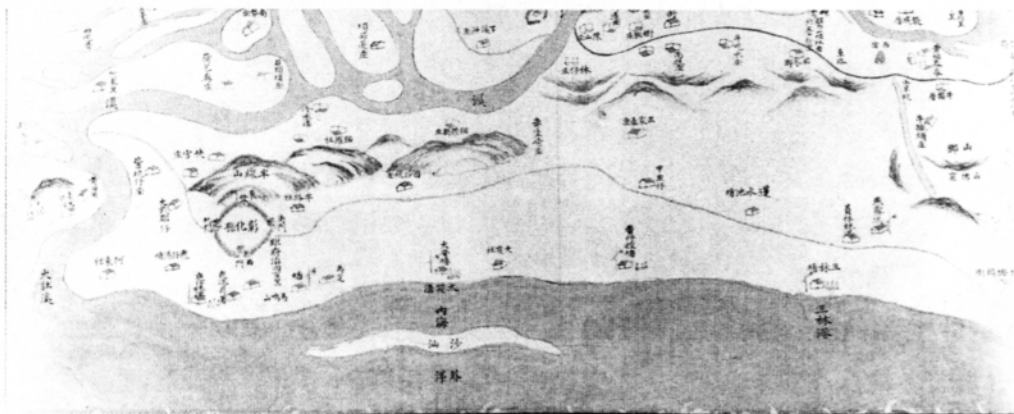
④ 施添福，〈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1991.6。

⑤ 方豪，〈康熙五十二年測繪臺灣地圖考〉，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臺灣學生書局總經銷，1969。


⑥ 莊吉發，〈錦繡河山——臺灣輿圖的繪製經緯〉，收入《故宮臺灣史料概述》，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⑦ 如太湖街汛防，安兵五路；半路竹汛防，安兵五名；芋荖林汛，安兵五名；二濫汛，安兵五名。以上四汛在今高雄縣湖內至岡山之間。中部方面，臺仔窰汛、海豐港汛、貓兒干汛、三林汛、二林汛、馬芝港汛，皆只安兵五名，以上在今雲林縣和彰化縣境。

較早的《諸羅縣志》(1717)卷七〈兵防志〉，汛對塘並無直接的統轄關係，目加溜灣、麻豆、新港、蔦松、府治五塘之地即鎮標之汛地，而諸羅縣的一汛二塘俱屬隨防千把總兼轄，斗六門的五汛四塘俱屬斗六門把總兼轄，半線二汛四塘、下加冬三汛四塘等亦然。本圖的汛塘當近於康熙朝的制度，與十九世紀如《彰化縣志》(1832)的燕霧汛管帶七塘(卷七〈兵防志〉)之階層制不同。



圖五

本圖西螺塘、二林塘、三林塘、番仔控塘、大安塘、鹿仔鹿汛、沙鹿塘和牛罵塘附近都畫有，形似三顆子彈並列(圖五)。此一標識南部北部的汛塘皆未見，而且只見於沿海的塘。上舉國立故宮博物院詳載番社社名的輿圖也有此符號，見於竹塹城西方的海口汛、中部的水裡汛和鹿仔港汛炮臺，亦在沿海地帶。這兩卷輿圖的「子彈」形標識代表什麼？查《諸羅縣志》〈兵防志〉水師防汛條云：「各港汛並設砲臺、煙墩、望高樓，以防意外之警。」推測這三顆「子彈」應該就是砲臺、煙墩和望高樓，屬於海防之設備。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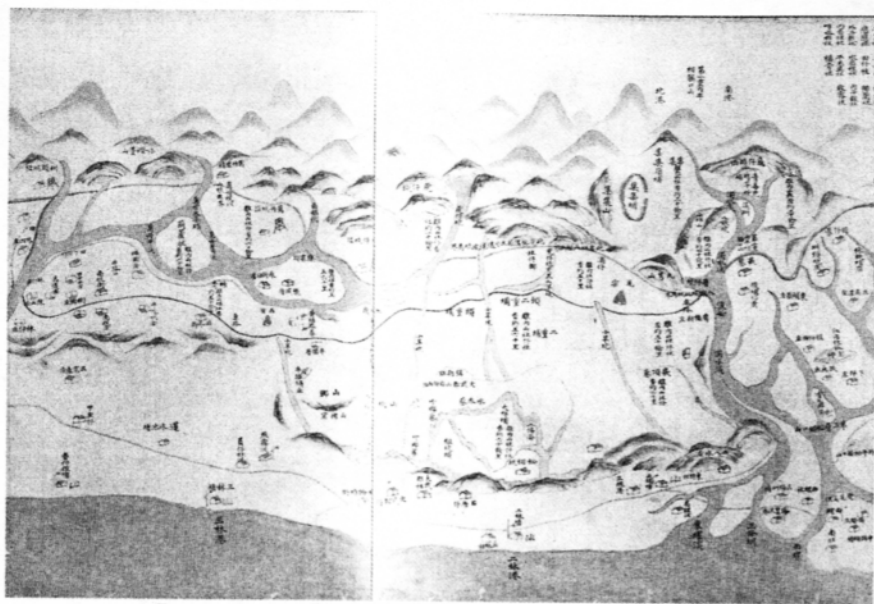
本圖相較於他種地圖，其史料價值之可貴者在於山前地帶從南到北所畫的紅色和藍色線，即題記所稱的「民番界址」。這是臺灣開發史極其珍貴的史料，也是漢人移殖者侵略原住民的具體見證。題記說：

以紅線為舊定界，以藍線為新定界。臺、鳳、諸三屬用紅線，源其舊也。淡防屬向無通身畫界，只山口設碑耳，今依新定界，用藍線。彰屬則于舊界之外，間置新界，故紅藍線並用。(莫斯科卷略同)

南部鳳山、臺灣、諸羅三縣的民番分界線在此圖採用紅色線，是依據舊有的定界。北部淡防廳，以前只在山口立碑為界，1760年的勘察定界，在本圖上採用藍色線。中部彰化縣則舊界和新界並存，故這一帶有紅藍兩色線。



彰化縣境紅藍二線並存，有些地段兩色線重疊，有些地段分開，後者必然是紅色線近西部平原，藍色線近東部山區，這是漢人墾拓最好的例證（圖六）。茲舉兩色線分開的一段來說明。北渡濁水溪，從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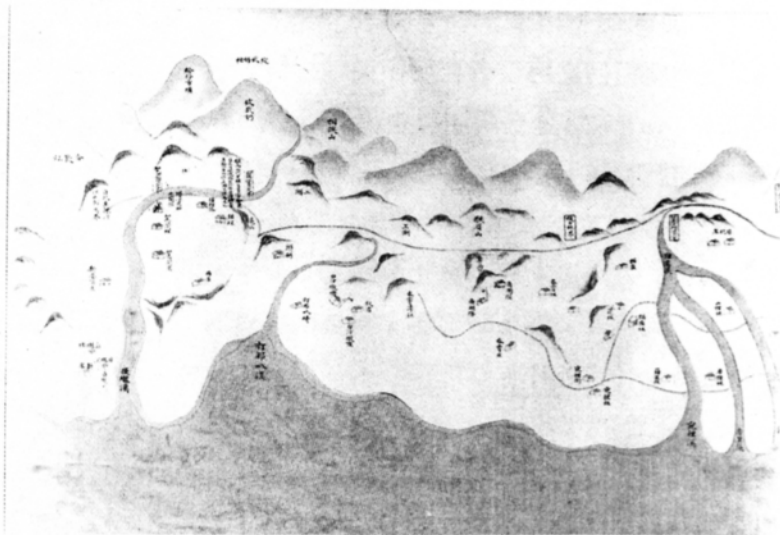


圖六

娘坑經二重埔、頭重埔、牛留厝、茄苳腳、牛吃水庄、南投庄、陳山庄，渡大肚溪，經外凹庄到埤頭坑隘，這一條線是舊有的民番界線，線以東的土地屬於原住民，漢人不得越界開墾。然而當1760年勘察時，界東已有漢人經營的瓦窯，還有十數個村落，官府只好承認既存的事實，再在東邊近山的地方畫界，這就是藍線的新界。

長條連綿的界線確立之前，只在山口設隘把守，防止原住民出入平原地帶，同時也不准漢人進入近山地區。隘通常搭蓋茅草屋舍，以供隘丁居住，謂之隘寮<sup>⑧</sup>。本圖北部屬於今日苗栗縣的南湖隘、貓理隘、加志關隘、尖山隘寮皆是。1760年定界時所畫的藍線，往往越過原來隘寮之外，和中部的情形一樣，同是漢人越界墾拓的見證。

（圖七）



圖七

回過頭來看看南部，本圖題記明言「紅線源其舊」，參證中北部的情況，這條紅線是不能說明1760年時南部漢人與原住民分佈的真實情況的：

⑧ 唐贊襄，《臺陽見聞錄》（1887）卷下〈防務〉隘條，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換句話說，在漢人墾殖較早的臺灣南部，所謂民番界址當遠遠在此線之東。那麼本圖紅線上的某某界（如姜埔林生番界）或界碑（如中坑生番界碑）也應該只是表示舊址而已，而非十八世紀中葉的實情。

\*

\*

\*

本圖從南到北的民番界線即臺灣史籍上有名的「土牛紅線」，我贊同伊能嘉矩先有隘後有土牛紅線的說法<sup>9</sup>。陳培桂《淡水廳志》（1871）說：

淡地內山，處處迫近生番，昔以土牛紅線爲界，今則生齒日繁，土地日闢，耕民或踰土牛十里至數十里不等，紅線已無蹤跡，非設隘以守，則生番不免滋擾。（卷三建置志）

這是比較晚期漢人越過土牛紅線，在新墾殖地向內山推移再設置的隘寮，是對原住民更進一步的侵略，不是先有土牛紅線才有隘寮也。

所謂「土牛紅線」，據伊能嘉矩說，早在明鄭創立屯田制之時就有土牛及紅線之稱<sup>10</sup>。此一論斷我現在還找不到證據，也不敢說本圖紅線「源其舊」的舊，是否可以追溯到將近一百年前的明鄭。伊能氏解釋紅線乃疊磚爲牆，如紅色之帶，施添福教授已辨其非<sup>11</sup>，當時連官衙所在的縣城都只是土城牆，沒有磚城牆，荒埔邊界何來這麼多磚？單以本圖題記來看，紅色標示早期的定界，藍色標識1760年新定界，足以證明「紅線」是當時官方勘繪界圖的體例，和紅磚完全無關。又因爲紅色線最早，故以「紅線」表示漢人與原住民的分界，不是所有的分界只畫紅線而已。

至於「土牛」，伊能氏認爲堆土積而爲壘，其外形如臥牛，這種看法施教授無辨，並且接受。然而所堆的土是挖溝而來的，故有「土牛溝」之稱。既然是溝，而且長得可以作爲行政區的邊界<sup>12</sup>，便不可能是牛形的土壘，所以「臥牛」云云也和紅線一樣，同是望文而生之義。

考察本圖，濁水溪到虎仔坑一段的說明云：

八娘坑北坑爲界

此處以山根爲界

此虎排溝築土牛透連虎坑爲界

這些文字反映一個史實，所謂勘察定界多是利用天然的山河或坑谷，作爲區隔漢

<sup>9</sup>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頁785，東京，刀江書院，1928。

<sup>10</sup> 同註<sup>9</sup>。

<sup>11</sup> 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劄記（一）：試釋土牛紅線》，《臺灣風物》39:2，1989。

<sup>12</sup> 《新竹縣采訪冊》卷一〈總括〉竹北堡云：北以土牛溝與淡水縣桃澗堡分界。

人與原住民的界線，在沒有天然險阻的地方，才挖溝築土堆。這種定疆界的辦法，早在西元前九世紀西周晚期散氏盤銘文記載的國界就這樣了，築土堆，當時稱作「封」。中國古代國家的國界大概多是採用這種形式<sup>13</sup>，1760年閩浙總督楊廷璋條奏本圖的定界也是用這種辦法，他說：

今據該鎮、道勘明，於車路旱溝之外，各有溪溝、水圳及外山山根，堪以久遠劃界。其與溪圳不相接處，挑挖深溝，堆築土牛爲界。至淡防廳一帶，從前原定火燄山等界，僅於生番出沒之隘口立石爲表，餘亦未經劃清。今酌量地處險要，即以山溪爲界；其無山溪處，亦一律挑溝堆土，以分界限。<sup>14</sup>

本圖竹塹城之北犁頭山界有注文云：「自此山至南腳下至員山仔，長八里，照丈一千四百四十丈，應挑滿埔土牛。」即從犁頭山腳至員山仔的平埔地築了1440丈的「土牛」，這是因爲無天然險阻，遂堆土爲界。築土堆的土是挖溝得來的，故曰「挑挖深溝，堆築土牛」，或「挑溝堆土」，因此既有「土牛」，必有「土牛溝」。

這段1440丈長的土堆，應像一道隄防，即如中國古代的「封」。西周散氏盤的「封」可能近似臺灣的土牛，而戰國時代的《管子》〈度地〉篇則稱作「土閘」。唐人尹知章注云，「閘謂隄」。閘本來是高高的門，何以說是像護城河的隄呢？道理即出在土牛與土牛溝的互生關係，「挑溝堆土」，即一邊是高土堆，一邊是深溝，《管子》「土閘」的名稱也正可說明是類似於土牛和土牛溝的工程。

土牛和土閘雖然同一個道理，但「土牛」是農民的生動語言，其名恐怕和古典的「土閘」無關。然而爲何長土隄而以「牛」爲名，我不敢妄測。記得小時候舊式碾米機具名作「土人」，碾米房稱作「土人間」。碾米機具既然不是人形，卻可稱作「土人」所以「土牛」也不必與「臥牛」之形糾纏在一起。（圖八）

<sup>13</sup> 參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頁584-585，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2。

<sup>14</sup> 《清高宗實錄選輯》卷一，乾隆二十五年，此利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資料庫。

## 【附記】

兩年前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與史語所訂定合同出版本卷「臺灣民番界址圖」，那時我擔任所長，完成簽約手續；不久我別有任務，這件出版合同也淡忘了。魏先生熱愛臺灣，凡對認識臺灣有益的事他都會努力不懈，投資出版，不計較成本。經過他的努力，這卷地圖終於要出版了，他仍然希望我接續前約，為這卷地圖寫一序文。固辭不獲，乃展卷重讀，不期然地寫下一些淺見，以續時賢之貂末，敬請海內外專家指正。

九十一年五月七日凌晨寫于史語所



圖八 國立故宮博物院建立前的景觀（郭秀霞女士提供）

土人間

農家